

在聒噪的时代里沉默与呐喊

朱大可作品研讨会纪要



时间：1999年12月25日

地点：北京邮电大厦会议厅

主办机构：北京鸽与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社科新数目·阅读导刊》

协办机构：湖南文艺出版社

记录与整理：张小茅（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按语】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尽管只发表了数量有限的文论，却在批评界拥有大量推崇者和追慕者，其长期坚持的“原创性写作”，已经受到普遍认同与尊敬。但朱大可在1994年出乎人们意料地出走澳洲，中断了这令人关注的写作。而富于戏剧性的是，朱大可在1999年的“复活”，成为北京文化界本世纪最后一个热烈话题。日前在乍寒还暖的北京举行的“批评的使命——朱大可文论作品研讨会”，不仅是旅居澳洲五年的朱大可“浪子回头”、“重返文坛”的信号，而且也成为中国批评界在新纪元重振旗鼓的契机。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大可专著《聒噪的时代》文集，收录了朱大可十年来最负影响的十二篇作品，包括“缅怀浪漫主义”、“燃烧的迷津”、“先知之门”、“空心的文学”、“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流氓的精神分析”等脍炙人口的文章，它们以奇特的隐喻式语体（有人戏称为“朱语”）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有力的解构与批判，该书的出版，一扫当下的伪思想、假文化和媚俗主义的颓败之风，为“大市疲软”的中国文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受到许多文化界人士的称誉和推崇，被认为是世纪末中国文化理论的一个“强劲的尾声”。

阅读导刊的主编张维特和编辑沈浩波主持了是次会议。参加研讨的有来自京沪等地的文学批评界著名专家学者：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白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教授陶东风、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孙津、《文学评论》杂志副主编许明教授、中国文化报副主编崔成泉、《中国文论报》副主编李秀龙、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张闳、中央民族大学敬文东以及当下走红的新锐诗人暨批评家徐江等等。此外，在京的许多著名诗人均到场祝贺。他们是：前《诗刊》主编刘湛秋、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诗人王家新、先锋诗人张小波、欧阳江河、李亚伟、宋炜、孙文波、侯马、树才和莫非等。他们在高度评价朱大可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所作贡献的同时，也就文学批评的现状发表了精彩见解。与会者认为，1999年中国文坛出现的批评风潮和朱大可的“复出文坛”，可能是文化复兴的一个微妙信号。

本次会议由著名诗人及出版人张小波策划，北京鸽与鹰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联合主办，湖南文艺出版社协办。新闻媒体代表则来自北京晨报、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精品与购物指南、中华读书报、中国合作新报美周刊、科学时报今周刊、和读者俱乐部杂志、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等。

张 闳：朱大可的写作最引人注目之处，即是其独特的文体特徵。新近出版的《聒噪的时代》（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编者注）一书是一部具有强烈的颠覆性的著作，首先是对当下各种话语方式的颠覆。与当前的三类话语体系——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大众流行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截然不同，朱大可完全形成了属于他

个人的独立而自由的话语方式。他的笔触能总是够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另一方面又通往信仰的高度。他似乎找到了一条由个人精神通往终极价值的通途。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读朱大可的文章，总是使我想到了“庖丁解牛”这个寓言。一种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的艺术。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而是一位“批评艺术家”。

许 明：大可的纯粹个人风格的华丽的语体，是一种美文，令人赏心悦目。但我在此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我认为在上海的市民现实主义文化中产生朱大可这样的批评家，是一个奇迹。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市民都市，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消解令人痛心。朱大可在这样的境遇中发展出他的人文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他的“缅怀浪漫主义”和“空心的文学”具有时间上的穿透性。他早在十年前就对市民现实主义和气功浪漫主义实施了严厉抨击，显示了高度的预见性。今天，人文主义、终极关怀和形而上的缺失，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回望朱大可的文章，可以说是字字有应。另一方面，人们一直对朱大可有一种误解，把他划为先锋派批评家。但我认为他的情感方式和信仰其实是非常古典的。他的先锋姿态掩盖了内在的道德传统。

孙 津：在我看来，朱大可的《聒噪的时代》实际上拉开了一个广阔的平面，他的视野从文学到神学、从当下景象到远古记忆，都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这是一个杰出批评家的标志。大可最终关怀的是人的命运。当下中国流行着一种我称之为“汉奸文化”的东西，也就是各个媒体在话语上竭力模仿港台和海外的流行语体，从而导致了大陆文化的颓败。朱大可的意义，就是确立了自身的话语构架，为文学和媒体创造自己的话语开辟了道路。

白 烨：我喜欢朱大可的文章，是因为他的批评体现了不妥协的批评精神。长期以来，朱大可始终坚持这种精神，真是罕见。从 80 年代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许多有风格的批评家都转向了，放弃了，而朱大可却始终如一。这种一以贯之的批评精神真是太少了。我认为，朱大可的文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具有广泛的意义。他的不妥协和不手软的批评精神应当予以首肯和张扬。他在 80

年代撰写的那篇谈论新时期文学死亡的《空心的文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从人文精神缺失的角度对许多作家进行了批评，此前，他还对谢晋电影模式进行了激烈批评，令人读来深感震撼。他所批评的对象在当时都是文坛名流，非常叫好的一些人。有一些问题我们当时也看到了，但他打得更狠，也打得更准。而更重要的是，他并不限于批判和颠覆，而是满含着一种更高的人文精神和理想。在他的犀利的抨击中充满着建设性的思想。另外，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语言风格。我向来主张批评也应当是一种创作，具有美文的特徵。我过去喜欢李健吾和勃兰兑斯的风格，就是这个原因。朱大可的批评文论确实有独特的魅力，以感性的语言表达理性的思想。他的文论中有一股奇异的气，推动他的行文向前滚动。他的每一个段落都相当短小，一个意思一个段落，简洁、精悍，读来非常过瘾，令我感到钦羡。80年代的批评整体上是疲软的，但现在已经有了重新昂扬的迹象。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

陶东风：我读了朱大可的《聒噪的时代》和附在其后的胡河清关于他的评论文章，我感到他们两个都是“巫师”。大可文章中流露出一种专断性和不容置疑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极富魅力。他洞察一切，同时又有一种“话语暴力”倾向。他将历史和现实统统置于他的话语暴力之下，他把屈原和李白等历史人物及许多历史景象都转换成为他个人的精神资源，进行自由阐述，形成了一种半文学半谶语的话语特徵。朱大可扮演着由哲学家、文学家和上帝等各种角色相混杂的复合体。神奇的超验的感悟、贵族式的趣味、还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这些在他身上都很奇特地结合在一起。（许明插言：他的这种文体实际上来源于马克思。我觉得，他对马克思的继承超越了某些自命不凡的人。他的诗意语言和批判精神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著述，特别是政论文章中找到渊源。）朱大可的批评没有对话性，他寻求的不是“对话”，而是“独白”，是自言自语。

黄卓越：朱大可的作品首先给我以惊异感，与我所读到的所有批评文章都截然不同。庞大的知识体系，结合著对于神话、历史和现实的明晰了解，丰富而密集地隐藏在其特有的批评构架之中。在我看来，大可的批评有两种风格类型，其一是诗性批评，采用隐喻式的写作，洋溢着诗意的光辉。其二是独白批评，他的文论

基本上是一种自言自语，也就是发展出了一种独断的和内省式的话语方式，采用排他法，把价值对象逐一排除，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他自己成了价值的内核。一方面他丧失了土地和家园，另一方面他却拥有一个灵魂的家园，后者是一种神性的东西。朱大可拥有自己的主体，他不是一个“空心人”。神秘的的语言锁链，带有咒语的性质，这些都是其特有的精神表徵。他的拒绝“对话”，也可看作是他的精神纯粹性的表现。

李秀龙：朱大可的文章我一直十分关注，也十分欣赏。他的语言极具穿透力和心灵的能动力，从他的文章中，我能够读到隐含在其深层的、充满某种情怀的东西。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从事写作的。他所面对的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面对生命。信仰问题不是一个理性的世界观念问题，我认为，恰恰是在世界观出现疑问时，也就是人们在面临生命绝境时，信仰才产生。在朱大可的写作中，充满了对人类这种生存经验的逼问，他以犀利的言辞直逼人类精神的核心。在精神的绝境处，让我们看到信仰的光芒。

张 闳：我想补充说明几点。我不认为朱大可的文体只是一种华丽、漂亮和抒情的风格，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美文”。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修辞学问题。它的风格奇崛，恍惚，意义复杂多变，它拒绝任何坚硬、武断的价值判断。这种奇特的文体是一种全新的美学表达，首先是对传统的制度化的美学的抵制和反叛。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大可的写作还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政治学意义。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朱大可的写作具有什么“人文深度”。它有一种深度，但不是人文主义的。他对诗性和神性的显现与众不同，常常将一些感官直接以超验的形式予以表达，把肉体的行为直接转换为灵魂的体验，排斥了任何（如朱大可自己所称的）“中间价值”的中介。人们往往将诸如“人文精神”之类的“中间价值”神圣化，终极化，这在朱大可看来只是人类自己所制造的一个精神“神话”。朱大可的写作则是要破除种种中间价值的“神话”，它可称之为“反神话”写作。

徐 江：我要借用足球界的一种现象来比喻文学评论界的现状。古利特主张要踢一种“性感足球”，也就是要求足球充满活力和美感。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变得越

来越深刻了，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但我觉得缺乏活力和美感，不好看。我要问，深刻是不是一定要以生涩和枯燥为代价？或者说，是不是非要陷入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不可呢？我在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之后，忽然发现历史著作也可以有另一种写法，写得像小说一样有趣，可读。历史著作尚且如此，文学批评为什就不能这样呢？“性感”就是生命力的充盈。我读大可的文章，一句话——过瘾！第一，他有不同凡响的勇气；第二，他注重了批评的文本性。他的文论既是学术论文，又可以当作文学创作来读。大可的探索为当代评论界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我希望有更多的批评家能够走这样的道路。

莫非：在 20 世纪的中国诗歌批评中，大可所达到深度和境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正是大可的价值所在。刚才徐江说希望有更多的朱大可出现，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也没有意义。

王家新：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是向朱大可表示敬意。在这个时代，能够读到朱大可的书，我感到很荣幸。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这样一位朋友在关注着精神生活，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幸事。

树才：朱大可本身是一股活水，他符合我的对批评的期待，他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他所关注的有时候是非常“古典”的——他关注生命本身。他身上似乎有一种很邪乎的力量。朱大可的存在使平庸的东西脸红。

孙文波：在当代中国，能够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的批评家极少。许多批评家的批评写作完全是随机的，单篇文章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从总体上来看，从立场到表达，一片混乱。我认为朱大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他有自身的立场，并能从这种立场出发，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纳入他的批评框架，从神话、历史到当代文学。我对他的某些观点并不同意，但对他的这种个性化的、成熟的批评话语体系十分钦服和尊敬。

崔景泉：我关心的是，朱大可文论——我指的是这本《聒噪的时代》——的出现

是否带有信号的意味？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之交，文学和文化的现状都令人不安。朱大可的重新出现，正与当下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重新活跃相呼应。我想，这是否预示着新世纪一个文化复兴时代正在悄悄逼近？

（对于一些在外地的批评家，《阅读导刊》作了远程电话采访，以下是电话记录的要点）

谢有顺（青年批评家）：朱大可和可贵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创造了一种评论文体，十分奇崛，别人很难模仿。朱大可的思路、知识背景、话语方式都极为独特，具有很强的独创性，这在中国批评界极为罕见。朱大可的知识体系中有两大背景作为支撑，这令其它人很难企及。其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洞察，热爱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有人在，但大都是一种迷恋，迷进去了，便再也出不来，而朱大可不是迷恋，是洞察，他很清醒，意识到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他意识到其中的黑暗觉得部份，他走进去了，但能全身而退。另一个背景则是对希伯来文明的了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朱大可对希伯来文明、对《圣经旧约》的了解是较为深入的。正是由于他对东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使他具备了对当下文化深切的把握能力，他甚至具备了一种从现状所提供的精神线索中对未来有所预见的能力。朱大可的迷人之处还在于他的激情、他的批判精神、他的终极关怀、他的艺术直觉、他的强大整合力。朱大可的真正价值至今还没有为人们所深切地认识到，总有一天，人们会回过头来翻开朱大可这一页的。

杜 釜（上海有线电视台“阅读”节目编导）：读朱大可的评论文章，真的能觉出所谓“语言狂欢”的感觉。朱大可的文字极为绚烂，通常的情况下，语言过于绚烂容易导致其质地的异化，使其沉浸于语言之中不能自拔。而朱大可的绚烂却是一种辞能达意的绚烂，从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朱大可的文章是字字珠玑。但这对读者的要求就更高了，因为读者很容易为其语言所迷惑，而难以深察其精神核质。这就象唐朝李商隐的诗，很多读者迷恋于李商隐诗歌中词语的光泽，而忽略了他的神髓。同样，朱大可的文章需要细读，细读之下，他的份量就会想庞然大物一样显现，他的文章中随时出现的灵光会使读者如同醍醐灌顶。

（全文原载文学双月刊《芙蓉》杂志 2000 年第 2 期）

